

三星堆

SANXINGDUI · GUSHUWANGGUODESHENGD

三星堆

古蜀王国的圣地

陈德安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32761
90/2
6834

三星堆

SANXINGDUI · GUSHUWANGGUODESHENGLI

26.32761
C390/2
0036834



三星堆

古蜀王国的圣地

陈德安 著

2248/25



0036834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 / 陈德安著；江聪摄. —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5

ISBN 7-220-04977-3

I. 三... II. ①陈... ②江... III. 出土文物—四川—图集 IV. K872.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28589 号

策 划：张问渔
顾 问：马家郁
撰 文：陈德安
摄 影：江 聪
责任编辑：张问渔
特约编辑：刘长久
装帧设计：周靖明平面工作室
封面制作：周靖明
责任校对：何秀兰

[Http://www.booksss.com](http://www.booksss.com)

E-mail: scrmcbsf@mail.sc.cninfo.net

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

陈德安 著

出 版：四川人民出版社
发 行：四川人民出版社
地 址：中国成都盐道街 3 号
制 版：天时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印 刷：天时印刷（深圳）有限公司

开本 889 × 1194mm 1/16

2000 年 7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ISBN7-220-04977-3/J·392

定价：1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2000. 9. 21

考古书店

謹以此書紀念三星堆遺
址考古發現七十周年

馬家柳



二〇〇〇の成都

目 录



三星堆——古蜀王国的圣地·····(1)	
1. 青铜立人像·····(13)	38. 青铜人面具·····(52)
2. 青铜兽首冠人像·····(16)	39. 青铜兽面·····(53)
3. 青铜鸟爪人身像·····(17)	40. 青铜兽面·····(53)
4. 青铜喇叭座顶尊人像·····(18)	41. 青铜兽面·····(54)
5. 青铜跪坐人像·····(19)	42. 青铜兽面·····(55)
6. 青铜跪坐人像·····(20)	43. 青铜兽面·····(56)
7. 青铜跪坐人像·····(21)	44. 青铜兽面·····(57)
8. 青铜树枝头及人面鸟身像·····(22)	45. 青铜人身形牌饰·····(58)
9. 青铜失冠人头像·····(23)	46. 青铜牌饰·····(59)
10. 青铜失冠人头像·····(24)	47. 青铜牌饰·····(60)
11. 青铜辫索冠人头像·····(25)	48. 青铜菱形眼形器·····(60)
12. 青铜戴盔人头像·····(26)	49. 青铜等腰三角形眼形器·····(61)
13. 青铜回纹冠人头像·····(27)	50. 青铜直角三角形眼形器·····(61)
14. 青铜平顶人头像·····(28)	51. 青铜太阳形器·····(61)
15. 青铜平顶人头像·····(29)	52. 青铜神树·····(62)
16. 青铜平顶人头像·····(30)	53. 青铜神树·····(64)
17. 青铜平顶人头像·····(31)	54. 青铜龙形饰·····(66)
18. 青铜平顶人头像·····(32)	55. 青铜虎形饰·····(67)
19. 青铜平顶人头像·····(33)	56. 青铜龙夔柱形器·····(68)
20. 青铜平顶人头像·····(34)	57. 青铜龙形饰·····(70)
21. 青铜平顶人头像·····(35)	58. 青铜虎形器·····(71)
22. 青铜平顶人头像·····(36)	59. 青铜鸟·····(72)
23. 青铜平顶人头像·····(37)	60. 青铜鸟·····(73)
24. 青铜圆顶人头像·····(38)	61. 青铜神树枝头花蕾及铜鸟·····(74)
25. 青铜人面像·····(39)	62. 青铜孔雀·····(75)
26. 青铜人面具·····(39)	63. 青铜鸟头·····(76)
27. 金面罩铜质平顶人头像·····(40)	64. 青铜鸟形饰·····(77)
28. 金面罩铜质圆顶人头像·····(41)	65. 青铜鸟形饰·····(78)
29. 金面罩铜质圆顶人头像·····(42)	66. 青铜公鸡·····(79)
30. 青铜人面具·····(43)	67. 青铜兽面纹铃·····(80)
31. 青铜人面具·····(44)	68. 青铜虎头形铃·····(81)
32. 青铜人面具·····(45)	69. 青铜花蕾状铃·····(82)
33. 青铜人面具·····(46)	70. 青铜鹰形铃·····(83)
34. 青铜人面具·····(47)	71. 青铜扇贝状挂饰·····(84)
35. 青铜兽面具·····(48)	72. 青铜蝉形挂饰·····(84)
36. 青铜兽面具·····(50)	73. 青铜执璋跪坐人像·····(85)
37. 青铜兽面具·····(51)	74. 青铜戈·····(85)



目 录

75. 青铜戈·····(85)
76. 青铜戈·····(86)
77. 青铜戈·····(86)
78. 青铜贝串饰·····(86)
79. 青铜三牛兽面纹尊·····(87)
80. 青铜龙虎尊·····(89)
81. 青铜三牛六鸟尊·····(91)
82. 青铜三羊三鸟尊·····(92)
83. 青铜四羊罍·····(94)
84. 青铜三牛六鸟尊·····(95)
85. 青铜四羊四鸟罍·····(97)
86. 金杖·····(98)
87. 金面罩·····(99)
88. 金箔鱼形饰·····(100)
89. 金箔鱼形饰·····(100)
90. 金箔虎形饰·····(101)
91. 玉戈·····(102)
92. 玉戈·····(102)
93. 玉戈·····(103)
94. 玉戈·····(103)
95. 玉戈·····(104)
96. 玉戈·····(104)
97. 玉戈·····(105)
98. 玉戈·····(105)
99. 石戈·····(106)
100. 石戈·····(106)
101. 玉戈·····(107)
102. 玉戈·····(107)
103. 玉戈·····(107)
104. 石戈·····(108)
105. 玉矛·····(108)
106. 玉矛·····(108)
107. 玉剑·····(109)
108. 玉刀·····(109)
109. 石斧·····(110)
110. 玉斧·····(111)
111. 玉斤·····(112)
112. 玉凿·····(112)
113. 玉凿·····(112)
114. 玉圭·····(113)
115. 石圭·····(113)
116. 玉圭·····(113)
117. 玉圭·····(113)
118. 玉璋·····(114)
119. 玉璋·····(114)
120. 玉璋·····(114)
121. 玉璋·····(114)
122. 玉璋·····(115)
123. 玉璋·····(116)
124. 玉璋·····(116)
125. 玉璋·····(116)
126. 玉璋·····(116)
127. 玉璋·····(117)
128. 玉璋·····(117)
129. 玉璋·····(117)
130. 玉璋·····(117)
131. 玉璋·····(118)
132. 玉璜·····(119)
133. 玉璧·····(119)
134. 石琮·····(119)
135. 玉琮·····(119)
136. 玉戚形璧·····(120)
137. 玉璜·····(120)
138. 玉戚形佩·····(120)
139. 玉环·····(121)
140. 玉管·····(121)
141. 玉管·····(121)
142. 玉珠·····(121)
143. 石蟾蜍·····(122)
144. 玉璞·····(122)
145. 玉珠·····(122)
146. 玉牙璧形器·····(123)
147. 玉牙璧形器·····(123)
148. 玉锥形器·····(123)



序幕

1929年春，在今四川广汉市城西约七公里的南兴镇真武村月亮湾燕道诚的住宅旁，燕道诚的大儿子燕青保带领兄弟燕青顺、燕青龙挖掘蓄水沟。正当傍晚时分，燕青保三弟兄惊奇地发现，在水沟底部静卧着玉璋、玉琮、玉璧、玉镯、玉圭、玉斧、石璧等玉石器，总数约三四百件。事隔不久，燕道诚将这批玉石器的一部分送给了亲戚朋友，一部分留存家中当作镇家之宝，不时也拿出几件向乡邻炫耀。一两年间，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挖出珍宝的消息不胫而走，古董商闻讯后蜂拥而至，争相收购“广汉玉器”。

1931年春，在广汉传教的英国牧师董笃宜（V. H. Donnithorne）在当地县官的协办下，收回了部分玉石器，旋即送交给华西大学博物馆戴谦和（D. S. Dye）教授保管。1934年3月15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 Graham）、林名均教授组成考古发掘队在月亮湾燕家院子旁拉开了川西平原考古的序幕。

传言

在月亮湾的南面约一里许，与马牧河隔河相望的台地上，有三个长约两三百米的圆丘状土堆，传说这是玉皇大帝从天上撒下的三把土，落在了马牧河的南岸，变成了三颗星，故称“三星堆”。当地人把三星堆、月亮湾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风水宝地，并赋予“三星伴月”的美称，后被清同治年间的《汉州志》誉为“汉州八景”之一。

月亮湾东面的横梁子、月亮湾的龙背梁子、月亮湾西面的青龙包横梁子以及顺鸭子河的狭背状台地，整个地形恰似一个“王”字形布局突兀在田野上，当地传言为“王城”，考古发掘也证明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城墙。不过，传言中这个“王城”是什么时代的，已经弄不清楚了。

穿越时光隧道

1934年春，葛维汉（David C. Graham）、林名均在燕家院子的玉石器坑旁新发掘出部分玉石器和陶器残片。葛维汉、林名均将发掘出土的器物照片寄给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郭沫若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你们在广汉发现的器物，如玉璧、玉璋、玉圭均与华北华中相似。这就是古代西蜀曾与华中、华北有文化接触的证明。‘蜀’这一名称曾先发现于商代的甲骨文，当周人克商时，蜀人曾经前往相助。”并预言：“如果将来四川地方尚有发掘，它们将显示出此文化分布的区域，并提供更多的可靠的证据。”从此以后，四川考古工作者把穿越古蜀时光隧道的目光盯在了月亮湾、三星堆这块圣地上。

1953年，西南博物院筹备处率先调查了月亮湾一带的古遗址，并在月亮湾东面的打楸田里进行了小面积试掘，获得了部分陶片和玉石器残片。1956年，四川省博物馆王家祐、江甸潮在三星堆、月亮湾进行考古调查，并将1929年出土的尚存燕氏农民家中的玉璋、玉琮、玉钺、石璧等文物带回四川省博物馆珍藏。1960年，四川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组又对三星堆和月亮湾等地的文化遗存作了全面调查。三年后，由四川省博物馆馆长、四川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及人类学家冯汉骥博士率领的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和四川省博物馆工作人员，在月亮湾开展了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收获颇丰。冯汉骥教授提醒大家注意：“这一带很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处中心都邑。”

1970年以后，马牧河两岸的三星堆和月亮湾一带古遗址因建砖瓦窑，致使大片的古文化遗址被挖掘摧毁。面对这一情况，广汉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敖天照心急如焚，他苦苦劝说砖瓦厂不要把文化层挖掉，并将挖土机挖出的陶片、石器、玉器文物一一拣回，放到文化馆文物库房内保存。1980年的初春，敖天照将这一情况向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考古队办公室作了详细汇报。四川省考古队立即作出抢救发掘三星堆遗址的决定，于1980年5月，对三星堆遗址开始了面积1200平方米的大规模考古发掘，首次在川西平原发现龙山时代（距今4000~5000年）至夏商时期（距今3000~4000年）的房屋基址18座，墓葬4座，出土了数百件陶器、石器、玉器文物和数万片的陶片标本。紧接着在1982年、1984年至1986年连续五次对三星堆、西泉坎等地的重要遗存进行发掘，并得出了三星堆遗址是以川西平原为中心、地方特征十分突出的古文化，时代最早可达距今五千年左右。最晚可到商末周初，距今约三千年左右的结论，同一个文化在同一地点绵延不断地发展2000年，实属罕见。

考古工作者从社会阶段、文化发展程度的角度出发，将三星堆遗址分为上下两大层：下文化层最早，距今五千年至四千年左右，正值华夏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至铜石并用时代，即处于氏族公社解体，阶级、国家产生的重要时期，在考古年代学上属于龙山时代。属于这个时期的川西平原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温江鱼凫城、郫县古城等三星堆周围地区的古城相继出现，说明此期为城邦部落军事联盟阶段，而三星堆遗址的古蜀部族无疑是这些城邦联盟的“雄长”。三星堆上文化层的年代较下文化层为晚，距今约四千年至三千年左右，中原的华夏族已进入阶级社会，处于夏商王朝时期。这一时期的三星堆遗址已有体量高大的城墙、



范围宽广的城址，也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业和玉石器加工业，有以多种神灵崇拜为主要内容的原始宗教信仰。由此证明三星堆遗址晚期，古蜀民族已率先进入了阶级社会，一个凌驾于周围酋邦部落的奴隶制国家——古蜀王国，雄踞在川西平原上。

石破天惊

1986年7月18日，从三星堆南面的南兴镇二砖厂取土工地上，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在取土断面的下方，暴露出玉戈、玉璋等精美的玉石器十余件以及经火烧泛白的碎骨渣。这一重要发现，使驻扎在砖厂清理考古资料的考古队员欣喜若狂，他们奔向现场，立即动员民工交出了出土文物，并将泥土中破碎的玉石器残片全部收集起来。根据出土物判断，这些高等级玉石礼器和烧过的骨渣并埋，肯定是一座大型墓葬或祭祀遗迹，于是决定采用探方由上而下进行试掘，以便弄清出土单位的开口层位和准确判断玉石礼器和烧过的骨渣埋葬年代。

尔后在文化层之下的生土上，出现黄褐色五花土并呈T字形条状分布。由此判断五花土是挖在生土上的坑内填土，而五花土的T字形分布则是坑道。挖完坚硬的夯土后，暴露出经火焚烧泛白的骨渣堆顶部，在骨渣的表面显露出被火焚烧过的陶尖底盏、器座、铜戈、玉戈等残块。从坑底最低处又清理出铜龙虎尊、铜盘、铜器盖、铜龙夔柱形器、铜龙形饰、铜虎形器以及头戴平顶冠并垂着发辫的人头像、头戴双尖角头盔脸戴面罩的人头像和失帽铜头像。在坑的中部，最后清理出一根长1.42米的金皮杖，杖的一端还刻着人头、鱼、鸟、箭等图案。这个坑呈长方形，口大底小，坑口长4.5~4.64米，宽3.3~3.48米；坑底长4.1米，宽2.8米，坑深1.46~1.64米。坑口三面各有一条宽1米的坑道，呈对称布局向外。这种形制的土坑，不是简单的器物埋葬坑。出土的许多器物被火烧过，如牛、水牛、羊、山羊、蚌壳以及人骨渣，这些迹象应和当时人们的宗教祭祀礼仪有密切关系，因此，考古发掘者将该坑定为“一号祭祀坑”。

一号坑出土的金器有金杖、金面罩、金箔虎形器、金料块等；青铜器有人头像、人面像、龙夔柱形器、龙形饰、虎形器、龙虎尊、甗、盘、器盖、戈、瑗等；玉石器有璋、戈、剑、戚形佩、凿、斧、斤、瑗、璧等；陶器有尖底盏、盘、器座等，另外还出土有若干枚海贝、十余根象牙和三立方米左右的烧骨渣。

8月14日傍晚，在一号祭祀坑东南二十余米处，砖厂工人取土时又挖出了青铜头像。考古队员迅疾返回刚撤离的工地，见到砖厂挖土断面的下方已暴露出坑的一角，堆满了青铜头像、青铜面具、玉璋、玉戈等器物。这无疑又是一个祭祀坑，考古队员将该坑编为“二号祭祀坑”，并在考古日记中作了详细记录。

经过7天的准备，于8月27日下午正式开始了对二号祭祀坑的发掘。二号坑虽然没有一号坑那样的坑道，但坑内的五花夯土仍然十分坚硬。在揭完填土后，坑内堆满了宝物。首先见到的是一件宽138厘米的铜纵目兽面具——阔口微张，舌尖外伸，长圆的眼球向外伸出近二十厘米，角尺状的大耳左右张扬。根据其特殊造型，有人马上联想到传说中的蜀人始祖神“蚕丛纵目”的形象，惊呼：“这就是蚕丛！”紧接着又发现数十根长长的象牙，在象牙之下的长5.3米，宽2.2~2.3米，深1.4~1.48米的长方形土坑内，又发现高达2.61米的青铜立人像、高3.94米的青铜神树、44件青铜头像，20件面具、兽面、跪坐人像、太阳形器、神坛、神殿、眼形器、铜铃、铜戈、铜瑗、铜挂饰、蛇、鸟、罍、尊以及金面罩、金箔饰件和玉石器等共约一千三百多件文物。另外，还出土了大量的象牙器残片、象牙珠和海贝等。





月亮湾西城墙发掘工地外景

二号坑出土的各种器物、饰品、神像、面具也经火焚烧过，但没有发现一号坑那样的烧骨渣，甚至连经火烧过的灰烬也极少。这些器物、饰品和神像除经火烧变形外，还有人为砸击毁坏的痕迹。这些气势非凡的神像和面具、庄重典雅的青铜祭器、温润精美的玉石礼器为什么会有如此的遭遇？这是迄今为止尚未完全解开的谜。

一、二号祭祀坑发掘后，消息迅速传开。国内各家电台、电视台、报社等新闻单位的记者蜂拥而至，竞相向全世界披露这一世界奇迹：“这个青铜雕像群

和与他们同地点出土的数量众多的重要文物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蜀地区青铜时代的历史提供了罕见的实物资料，填补了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空白，把蜀文化上限向前推进了一千多年。”“三星堆文物的发现有力地证明了商周时期的古代蜀国已有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从而否定了以为古代蜀国文化比中原文化发展缓慢之说。”海外新闻媒体及考古学界也立即作出回响，认为“这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考古发现”“比中国著名的兵马俑更加非同凡响”，“他们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海内外的高度赞誉使三星堆在中国考古学上的崇高地位更加凸显。

古蜀的传说和信史

相对中原华夏族而言，蜀族居住在西南边陲地带。虽然早在夏、商时期，蜀和中原王朝就有交往，如甲骨文记载，商王朝曾向蜀抽调射手三百；武丁时期，商王征调军队讨伐蜀。但蜀的历史、外交等都被湮灭在华夏族的历史记忆中，仅在后代的传说记载中略见片言只语。西周初年武王伐商，会师于孟津，诸侯八百，蜀和庸、羌、髳、微、卢、彭、濮等西南、西北以及江汉的边陲民族排在一起。蜀的使节参加周王在洛阳举行的盟会，被安排在司令台两边的外邦席上，手中献上的是“文翰”五彩鸟。可见当时在华夏族的眼中，蜀只不过是邦外之长罢了。至魏晋时期，东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中才有片段关于蜀的历史和传说记载，蜀起源于三皇五帝中的人皇，至皇帝时代，黄帝之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子高阳，即颛顼帝，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蜀和中原华夏族联姻了。蜀先后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蒲泽）、开明等诸族系的首领建立过统治王朝。只有开明氏的世系稍详，传说开明氏统治蜀国前后共传位至十二世，在公元前316年（周慎靓王五年，秦惠文王更元九年）秦灭巴蜀的战争中，开明十二世“蜀王自于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拒之，败绩。王遁走，至武阳（今四川彭山），为秦军所害。其相、傅及太子退至逢乡，死于白鹿山，开明氏遂亡”。至此，古蜀国灭亡，蜀文化逐渐被融合在汉文化中。

三星堆遗址分布面积约十二平方公里，是夏商时期川西平原上最大的一处遗址。在遗址的东、西、南三面有长达1800米，高2~10米的夯土城墙，城内面积约三至四平方公里，城内又有诸条城墙与河壕结合，将城内划分为月亮湾城墙的东西两翼、月亮湾北面的西泉坎、三星堆南北两侧等5个部分。城中有宫城，宫城外有廓城，表明夏商时期古蜀国的城廓制度已非常完善。三星堆遗址（包括一、二号祭祀坑）的出土物，除少部分具有中原地区的文化因素外，绝大多数器物具有本地特征，体现出一种地方土著文化风格。考古学者从三星堆遗址所处的地域和文化分析，被确定为距今5000~3000年间的古蜀文化的遗存。从其文化内涵丰富、发展程度高于同时期其他古遗址或古城址来看，这里无疑是一处方国的中心都邑。

认识古蜀文化遗存是从1940年发现春秋战国时期的巴蜀青铜兵器开始的。春秋战国之前的蜀文化，在三星

堆遗址发现前，尚属空白。三星堆遗址的年代可从夏商时期上溯到铜石并用时代的龙山时期，并包含了蜀文化的源头。从蜀文化发展的谱系来看，三星堆遗址与其年代稍晚的新繁水观音及成都方池街、十二桥、指挥街等遗址所反映出来的蜀文化面貌，是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蜀文化一脉相承的。如在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坑中出现的十字形铜戈、铜钺，陶尖底罐、圆底罐、高领罐、瓮、缸等器类形制，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蜀文化中一直都沿用。

被视为蜀人祖神的蚕丛氏是最早建立蜀国的部族，在开明氏之前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蒲泽）诸氏族，都与鸟或鸟捕食鱼有关系。三星堆遗址和祭祀坑出土的许多鸟造型器物，透露出古蜀国的文化特质。

蚕丛纵目和眼睛崇拜，在二号坑中出土了数十件三种组合方式不同的眼形器：第一种为菱形，中间有一瞳孔外凸，四角有穿孔；第二种为菱形眼形器的一半，作等腰三角形形状，由两件拼合成第一种的形制；第三种为菱形眼形器的四分之一，作直角三角形形状，由相同的四件拼合成第一种的形制。这三种眼形器都是宗庙里神像的眼睛，共同的特点瞳孔较突出，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在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三件双目突出的巨大的纵目面具，正是《华阳国志·蜀志》中“其目纵，始称王”的蜀人先王“蚕丛”的形象。不仅如此，有关眼睛崇拜的题材还见于日常生活用器和装饰品，如三星堆出土的陶高柄豆的圈足上刻划的眼目形符号，以及一件相当于二里头时期的铜牌饰，直接用带瞳孔和睫毛的眼形器作为主要装饰。

柏灌、鱼凫、杜宇和鱼鸟图案在三星堆遗址中，以鱼鸟相结合或单独以鸟为造型特征的器物特别多，这和文献中记载柏灌、鱼凫、杜宇等王朝都以鱼鸟或鸟为图腾崇拜是一致的。柏灌、杜宇均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鱼鸟结合图案是鱼氏族和鸟氏族互用的图腾标志。在一号坑中出土的数十件鱼形玉璋，是鱼氏族图腾的标志，同时出土的一件鱼形玉璋端部又镂空出鸟的图案，为鱼氏族和鸟氏族互用的图腾标志，这与鱼、凫（鸟）氏二部族联盟



一号祭祀坑全景

的史实有密切关系。由于鱼凫部族联盟制的解体，“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华阳国志》）后来以鸟为图腾崇拜的杜宇族取代了鱼凫族而成为蜀国的统治者。《蜀王本纪》说：“后有一男子曰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治汶山下，邑曰郫。化民往往复出。”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金杖图案，其下为两个头戴锯齿形冠的人头，均粗眉大眼，阔口，戴耳饰，人头两两相对；在人头上方刻有两组成对飞鸟的驮负着被箭射中的鱼，这与鱼鸟相结合的玉璋形成鲜明的对比，寓意着鱼鸟结合的部族联盟已经解体，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取得王权地位。这个以鸟为图腾的部族就是继鱼凫王以后的杜宇氏。一号祭祀坑埋下的经火烧过的铜器、玉器，以及烧过的人骨渣，也许就是鱼凫王“忽得仙道”，杜宇“自立为蜀王”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遗迹。

在三星堆遗址第二期以后，大量出现以鸟为题材的雕塑品。如青铜鸟形饰、立鸟、大鸟头、陶塑杜鹃鸟以及青铜钺、尊上的鸟形饰。此外，还大量出现一种鸟头柄勺，勺斗呈半椭圆形，勺柄犹如鸟引颈前伸，造型十分生动。这种陶鸟头柄勺，有的学者认为就是《礼记·明堂位》中记载的“蒲勺”。郑玄注：“蒲，合蒲，如鸟头也。”蒲勺就是鸟头柄勺。杜宇在取代



一号祭祀坑出土情况全景之一



一号祭祀坑出土情况全景之二

鱼凫氏的统治地位以后，更名为蒲卑，又传杜宇死后化为杜鹃鸟。可见杜宇族是以鸟为图腾的氏族。

以上可见，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器物同文献记载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时代的传说有诸多吻合。这也可以说是考古工作者从地下找到了古蜀国的信史。

古蜀王国早期都城的再现

《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开明王自梦郭移，乃徙治成都。”也就是说开明氏在取代杜宇氏的统治后，不久就从郫邑迁治成都，至秦灭蜀为止，均未迁过都。开明氏迁治成都之前的都城在哪里？根据考古发现，开明氏之前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诸王的都城在瞿上——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东、南、西三面现尚存高大的夯土城墙。据当地年长者称，北面也有城墙，后来因鸭子河洪患及河流改道被冲垮了。在鸭子河以北的新平乡（太平场）古城村，据说这里也有古城墙。经考古钻探，东城墙现存长度约一千八百米，北偏东 12° ，现存高度2~4米；西城墙南北两端近几年来被鸭子河和马牧河洪水冲涮，现存长度约八百余米，北偏东 25° ，高度4~8米；南城墙筑在马牧河的弯道上，其东西两端已被马牧河洪水冲涮，现存长度约一千一百米，露出地表达2米以上。以东、西、南三面城墙的距离来推算，三星堆遗址城内面积约三至四平方公里。在城墙外周地带，还有连结成片的古文化遗存分布，其范围东至回龙村、西达大堰村，南抵米花村、北跨鸭子河。在鸭子河北岸的高骊乡也曾出土过玉石器和铜牌饰，说明这一带也有三星堆遗存分布。在廓城内的青龙包、三星堆、月亮湾又发现城墙，这三处城墙的范围应属宫城的所在地，说明三星堆古城的宫殿区就在月亮湾以西的真武宫燕家院子至西城墙青龙包一带。不论是外城墙（廓城墙）或内城墙（宫城墙）的外侧均有宽达四十余米的人工河道（即城濠），这些人工河道两端分别与鸭子河和马牧河互相沟通，形成一个既有防御作用，又兼具交通运输和排放污物功能

的人工运河。

在三星堆遗址内还发现各种建筑遗迹，有多种长方形、方形和圆形等房屋，布局有单间、多间排列和组合式。沟槽基础、木骨泥墙、榫卯梁架的木结构房屋是古蜀建筑的特色，最大的房屋面积达200平方米，在月亮湾就发现了长宽达60~70厘米的长方形柱洞成排分布，说明这时期已有殿堂式建筑。另在城址内还发现陶窑和宽高达一米以上的大型玉璞、玉料，证明城内有规模可观的制陶琢玉工艺的生产作坊。三星堆、真武仓包包祭祀坑、仁胜砖厂具有祭祀意义的“墓葬”区，以及各种宗庙神像、神器、祭礼器和具有王权标志的金杖出土，表明古蜀人已有较为发达的宗教礼仪制度、青铜铸造技术和黄金冶炼加工技术。由此可见，三星堆遗址是一个范围广大、人口众多的大型中心聚落，至距今3000~4000年这段时期，已发展到高于氏族部落的、稳定的、独立的政治实体，即三星堆古蜀王国。

国王兼祭司的青铜立人像

在二号祭祀坑中出土了一尊高达2.61米、重一百八十多公斤的青铜铸造的立人像。如此高大的青铜铸像，在商周时期青铜文化中极为罕见，即使放在世界古文明中来看，也是绝无仅有的。这尊人像站在由四个龙头连体支撑的方形底座上，头戴高冠，粗眉、大眼、高鼻、阔口、丰耳，细腰修身，着深衣，粗硕的胳膊平抬起来，两拳握成一个大圆圈，神情庄严、肃穆。头上戴的回纹圈筒冠上有代表日（太阳）的莲花图案，上身着窄袖与半臂式三件套上衣，外层领缘有绶带，上衣右侧上下饰两尾相对的龙纹，左侧饰横倒的蝉纹，前后饰勾卷的虫纹和目纹相间组成的“蜀”字纹，下着裙裳。从衣着来看，颇具帝王气度，加之站在兽面连体座上的那种显赫地位，这在出土的众多人像、人头像中十分突出。我们认为他既是王者，又是祭司。把他陈设在宗庙中，含有祈求上帝、鬼神和祖先亡灵庇佑其臣民子孙的象征意义。

不同族群的青铜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人像可分为三类：一是全身人像，又分跪姿和站姿两种；二是人头像；三是半人半动物结合的人像。

青铜全身人像，除高达2.61米的青铜立人像外，还有手放在膝上或股部正跪坐的人像和侧跪坐的人像，神坛中层四方手拿弯钩状物（疑是灵芝）的站立人像和神坛上层四方各有5人均手呈握抱状的跪坐人像，以及二号神树三面有呈献祭状的人像。献祭人像手中的祭品，一是灵芝，二是牙璋，似为地位高于巫祝身份的主祭者。一号祭祀坑出土的跪坐人像，头发后披，卷髻，宽脸方颐，圆眼正视前方，张口露齿，神态严肃。从面部特征来看，跪坐人像也戴有面具，但和其他戴面具人像阔口紧闭不同。从侧面看跪坐人的形象酷似甲骨文中的祝字，似为巫祝跪在那里张口作祈祷状。再从跪坐人像的服饰看，上身着右衽长袖短衣，腰间系带两周，下身着犍鼻裤（又叫“丁字裤”），一般说来着犍鼻裤的人，其身份和地位不是很高。

青铜人头像中，绝大多数为平头顶，少数为圆头顶。以冠帽发式来看，似有身份地位的区别。既无冠帽又无头饰的平顶人头像，绝大多数为编发，少数为椎髻；戴帽或发饰的人头像均为短发，冠帽的种类有圆筒形帽、辫索状帽、双尖角头盔以及戴“颈”者。在全身人像中，不论是呈跪坐姿势的巫祝，还是国王兼祭司的立人像，无一为编发者，这说明编发和椎髻者的地位是比较低的。汉代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西南夷”中有编发和椎髻者，其民族归



二号祭祀坑出土情况局部

属为“氏”，“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三星堆青铜人像中的巫祝或国王兼祭司的上层人物戴冠帽，应是蜀族人的形象，椎髻或编发者则应是蜀族以外的夷人。我们从三星堆青铜人像中获知，古蜀民族早就是穿着右衽衣、穿裙子、戴冠帽，起居跪坐礼仪习俗与华夏民族相同。公元前316年，张仪、司马错在秦惠文王面前辩论伐蜀问题时，指斥蜀民族是“戎狄”，恐有贬责之嫌。

人面具与兽面具

中国古代称面具为“魃头”，可存亡者魂气，亦可驱鬼逐疫。巫祝或祭司戴上面具，就可以和上帝、鬼神和祖先亡灵沟通，进行祈祷或代表他们说话。根据一些民族学的材料，可知巫祝与亡灵沟通和鬼神打交道的基本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巫师过阴，由灵魂去找鬼神；另一种是吁请神灵降临附体，降神的范围主要是上神以及先祖。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商人以物质形式表现灵魂的鬼字，是一个戴面具跪坐的祈祷者巫祝或祭师，巫祝或祭师戴上代表上神或祖先亡灵的面具，就能获得超自然的神力。

三星堆出土的面具有人面具和代表蜀人始祖神的兽面具两种。兽面具为方面，宽额，两颊微内收，口阔而深，口中舌尖外吐，大兽耳，长刀眉，弧边棱柱状眼球向前凸出十几厘米，将眼肌拉出来附着在眼球上。从造型看，似人非人，似兽非兽，是集人和动物于一体的神灵形象。人面具分为大、中、小三种类型。但每一种类型又有若干件，大小相同。造型与戴面具的青铜人头像相同，方面、粗眉、大眼、阔口、闭唇，鼻梁棱直，均以遒劲的线条刻画面部表情。这种造型雷同，组合成组的青铜人面具，并非每一件代表某一独特的神灵，而是象征具有广泛意义的上帝(天)、诸神乃至远祖先王等神灵。同高大的青铜立人像、跪坐人像以及青铜人头像一样长期供奉在宗庙内，让人们祭祀，祈祷神灵护佑。



二号祭祀坑出土情况全景之一

蚕丛纵目与光明之神

三星堆出土的象征蜀人始祖神蚕丛的纵目兽面具，其造型特点是一双特别突出并向前伸出的眼睛和高耸的夔龙状的额饰。殷墟甲骨文中的蜀字，其形状是上为一只大眼睛，下为卷曲着身子的爬行动物。西周早期的《班簋》铭文和周原出土的甲骨文中的蜀字，除上为大眼睛外，其下为卷曲身子的虫形。殷、周甲骨文和金文中的蜀字，应是指川西平原蚕丛氏的蜀。不论是甲骨文或金文，还是纵目面具，都特别强调突出的大眼睛，可见华夏民族和蜀人一样，在对蜀人始祖神的认知上是相同的。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相当于商代早期的铜牌饰上有镂空的眼睛纹样，其形状和二号祭祀坑出土的菱形眼形器十分相似，上下眼眶之间有眼睫毛。出土的眼形器有菱形、两件等腰三角形组合成菱形、四件直角三角形组合成菱形等三种形式，在陶高柄豆的圈足上也刻划有眼睛的符号。另外，还出土了数件近似纵目面具眼睛的眼泡。可见，在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有关眼睛崇拜的题材较多。蚕丛为何纵目以及有关眼睛崇拜的内涵是什么？从现代生物学的观点看，动物的眼睛长得平与凸，是与动物所处环境的光线强弱相关的。如海洋中的鱼类，生长在浅水处的鱼，眼睛平凹，而深水处的鱼，眼睛凸出。其原因在于浅水处光线较强，深水处的光线较弱，鱼类不得不通过“调焦”来分辨方向和看清物体。“蚕丛纵目”应和蜀人居住在成都平原多雨多雾的自然环境有关。蜀地夏天雨多，冬天雾大，一年四季晴朗天较少，固有“蜀犬吠日”之说。在《山海经·大荒北经》中记载有一种掌管光明之神“烛九阴”(又称“烛龙”)，其特征是“人面蛇身而赤，直目(纵目)正乘，其瞑乃晦(闭着眼睛

天下一片黑暗),其视乃明(睁开眼睛天下一片光明)”。以此我们可以推测蚕丛不但是蜀人的祖神,也许和烛九阴一样也是掌管光明(太阳)之神。如果真是这样,三星堆出土的许多眼形器、眼泡的内涵应该和太阳神崇拜有一定的关系。

神树和蜀人的太阳神崇拜

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中出土的青铜神树共6棵,其中大神树2棵,小神树4棵。大神树又分一号神树和二号神树,造型基本相同。一号神树最大,由树干、树底座以及树旁的飞龙三部分组成,通高3.96米,树干残高3.84米。树底座呈圆锥状,座上 and 下面的座圈上都有由⊙(代表太阳)和云气纹构成的图案,整个树底座象征高耸的神山;树长在神山的顶部,三条根茎外露,显得这棵树苍劲挺拔;树干由下至上长出三层树枝,树尖上的莲花状花果已残,每层树枝下侧的树干上和花果果托下均铸出光环;每支树枝的花果都分别为一个上翘,另一个下垂,上翘的花果上均站立一鸟;在树的一旁,又铸出一条绳索状身躯的马面飞龙蜿蜒而下。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最有影响力的神木有建木、扶桑和若木。传说“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淮南子·地形训》)都广在天地之中,建木在都广,起到天梯的作用,颇似西方的宇宙树。《山海经·海内南经》描述建木的形状是“其状如牛,引之有皮,若纆、黄蛇。其叶如罗,其实如栾,其木若蓝,其名曰建木”。从这两棵大神树来看,造型不像建木,而和《淮南子》、《山海经》等有关若木、扶桑的记载较符合。《淮南子·地形训》:“若木在建木西,末有十日,其华照下地。”高诱注:“末,端也。若木端有十日,状犹莲华,华,犹光也,光照下地也。”《山海经·大荒东经》:“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鸟。”《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在黑齿北。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淮南子·天文训》:“日出于暘谷,浴于咸池,拂于扶桑,是谓晨明。”从文献记载来看,扶桑和若木都和太阳的关系密切。扶桑(扶木)居于东方的汤(暘)谷,建木在天地之中,若木在建木西,位于天地的西极。在古人的宇宙观看来,太阳是早晨沿着扶木(桑)升起,傍晚又顺着若木慢慢降落,进入羽渊,然后经过黄泉,第二天又从扶桑上徐徐升起,这样周而复始地运转着。

其实,有关扶桑和若木的神话传说,不过是古人观察日出和日落等天象的客观记录。当太阳从海面(或高山)上升起或者降落时,特别是在寒冷地带,因受云层中水蒸气的影响会产生分光衍射作用,将日晕拉长形成一树形光柱,好像太阳是沿着树形光柱升起来的,这种日晕现象古代叫做“日直”。这样的现象在今天早已有完整的科学解释而不足为奇。但在古人的眼里,日晕这种太阳光柱的出现,往往被看作是具有某种神力的特异现象,预示着人间的善恶吉凶的到来,这就是古人对日神朝迎夕送、朝宾夕饯的由来。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

这两株神树,应是古蜀人崇拜太阳神的祭礼实物。从二号祭祀坑青铜神树的形状,以及树座上代表太阳的⊙和⊙周围的气团——云气纹、立鸟、树干和树枝花果果托下的光环等内容来看,这两株神树,应是古蜀人在宗庙中朝宾夕饯太阳神时所使用的代表东方日出的扶桑和西方日落的若木。

用山川之精英向神灵献祭

从世界范围来看,古代对玉的使用主要在太平洋盆地的四周,最早大约在旧石器时代的晚期,但最终将玉



二号祭祀坑出土情况全景之二

从石中分离出来并进行特定的加工则是新石器时代。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玉器因其晶莹剔透、五彩斑斓，被视作山川的精英，具有山与水的特性，被赋予了社会化、人格化的功能，在宗教祭祀礼仪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三星堆出土的玉石器主要有璋、圭、琮、璜、环、璧、钺等礼器，也有戈、矛、剑、刀、戚等兵器，还有斧、斤、凿、锥、铲等工具。其中兵器和工具都不是实用器，应是礼器。作为兵器的玉戈和作为工具的玉铲都和玉璋的起源有关。如斜弧刃的玉璋，明显可以看出是由玉戈发展而来，从叉口刃的鱼形玉璋形制看，只是在玉戈的阑部两侧增加了齿饰，前锋末部开了小凹槽形射（璋的端部）。从三星堆玉石器的发展演变来看，礼器起源于工具和兵器。因此，并不排除这些兵器和工具在专们化的礼器出现以后，仍有作为礼器使用的可能。

根据《周礼·春官宗伯第三》记载，璋在三代(夏、商、周)的礼器中主要用于祭祀、朝聘、发兵、丧葬等礼仪范围。璋是三星堆遗址中出土最多的且颇具特色的一种玉石礼器，一般可分为两种：一是前端射部呈斜刃口的中原式玉璋，二是射部呈叉口刃的和整器呈平行四边形的蜀式玉璋。在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尊呈跪座姿式的手执一件射端呈叉口刃的玉牙璋小铜人之前，中国各地出土的玉璋都不明其使用方式，被推测为装柄作仪仗使用。在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件呈平行四边形的玉璋祭山图案上，也有这种玉牙璋插在神山山腰两侧的祭祀场面，可知玉璋在祭祀礼仪中的使用方式是手握或安插在一定的地点。

璧、环、璜也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最多的种类。在1929年发现的玉石器坑中，出土了大量的石璧和玉璧，大者直径达80厘米，为中国石璧之最；小者几厘米至十余厘米不等。这些应是用于祭祀天地山川的礼器。1987年在三星堆遗址真武仓包包祭祀坑中，也见石璧由大到小垒叠于坑中。在三星堆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还经常出土大量的残石璧和石璧芯，可见在当时的宗教祭祀中，这种礼器的使用量相当大。璧、环、璜在三星堆玉

石器中很难将其截然区分开，如二号坑出土的这类器物的直径由大到小呈递减趋势，好孔直径大小相等，只是肉的宽度不同。这一方面说明在商代制作这类器物还无严格的定制，好孔直径和肉的宽度的大小应和管钻的直径有关；另一方面说明这类器物的肉宽呈递变趋势，可能和使用这类礼器与按大小顺序摆放有关。琮是古代的祭器，外方内圆，中有圆柱状穿孔，两端孔缘外凸部分，被称作“射”。琮与璧在祭祀天地中互相配合使用，故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即璧象征天空，琮象征地母(或象征女阴)。三星堆遗址出土的玉琮，较早者器身方直，射为八棱；稍晚者为圆射，或射身方圆委角。琮和其他祭祀山川的玉石礼器成组同出，可见琮同样有祭祀山川的功能。1929年出土的一件玉琮，侧面刻有三条平行线和两个类似人眼的圆圈，其形象颇似分布在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良渚文化玉琮上的兽面纹。说明早期蜀国玉琮的文化内涵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得多。祭祀山川用玉石器作为供物，这可能是渊源于原始的自然崇拜。在古人看来，高大的山峰直耸云天，不仅是神灵上天达地的必经之路，也是神灵经常居住的地方。山上的珍禽猛兽、奇花异草、树木瓜果以及金玉石水等自然物，也归这些神灵管辖或为神灵所有。人们所获取的自然物，是神灵赐予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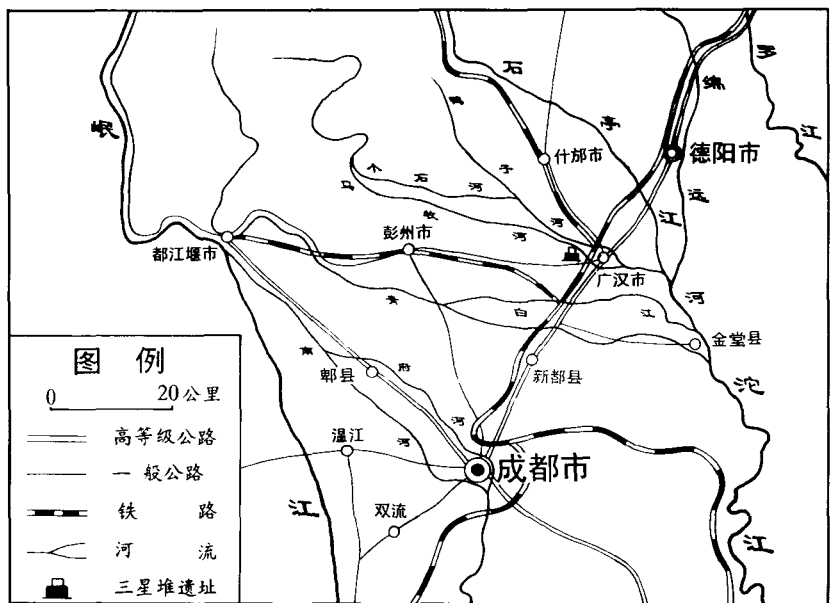


三星堆遗址仁胜村墓葬玉器出土情况

部分。按照自然崇拜的祭礼，往往要将获得的自然物中的一部分奉还其神灵作为报答。因为古人认为，万物由神灵主宰，若不报答神灵，一旦惹怒神灵，必将给人带来灾祸。玉石器取诸山川，为山川之精英，所以古人用玉石器作为供物进行献祭。

三星堆文明与夏商文明的关系

《华阳国志·蜀志》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至黄帝，为其子昌意娶蜀山氏之女，生了高阳，是为帝誉；封其支庶于蜀，世为侯伯，历夏、商、周，武王伐纣，蜀与焉”。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中，可推知蜀与中



三星堆遗址位置示意图

原文化联系最早的器物是高柄豆和陶盃。高柄豆是中原龙山至二里头时期的典型器物。陶盃的形制是三足中空，有口、有流、宽釜的酒水注器，在中原地区大量发现于二里头夏文化遗址，在二里冈早商文化中，仅见有仿陶的铜盃。据古代文献记载夏人称盃为“鸡彝”，是夏人在举行裸(音灌)礼时所使用的祭器。三星堆出土的玉牙璋中，除有本地风格的玉牙璋外，还在1929年、1986年、1987年先后出土二里头类型的牙璋。类似二里头文化的玉戈，在三星堆遗址中也有大量发现。二里头文化特有的青铜牌饰，也在三星堆遗址出土。这些含有中原夏文化因素的器物在蜀地出土，说明古蜀民族早在夏代，就与中原夏民族有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蜀人吸收了中原夏民族的制玉、金属冶炼等技术，并把夏人的礼器形制借用过来，形成自己的宗教礼乐制度。

商代是中国奴隶制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其青铜文明在世界古代文明中放射出耀眼的光芒。三星堆文化的特质反映出古蜀民族在不丧失主体的情况下，吸收了灿烂的商代文明，不论是陶器、玉器，还是金器、铜器的形制和器类组合形式都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形成了具有古蜀地方特征的文化。同时，古蜀民族又大量吸收了商代文明中的某些因素，如陶器的尊、觚、斝，玉石器的戈、刀、戚、璧、环、瑗、圭、琮等，以及铜器中的甗、尊、罍、盘、盖等礼器，明显地看出是商代器物中的形制。以此说明古蜀文明的辉煌成就，是与高度发达的商代文明的影响和交流分不开的。

三星堆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关系

长江文明和黄河文明是中华文明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长江中下游的华南地区有上万年的稻作文化历史；长江下游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中国最早的玉器；距今4000~5000年的良渚文化玉器是中国青铜文明之前的玉器文明的代表；长江中游的湖北枝江城背溪发现了长江流域的彩陶。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文化向南发展已进入长江中游地区，这里曾是商王朝的“南土”。

三星堆文化辐射的范围，北达陕南汉中，南抵雅安汉源，东出三峡和夏商文化相接触。因此，三星堆青铜文明中某些夏商文明（包括商代的长江文明）因素，正是三星堆文明出川向外辐射接触的结果。在商王朝灭亡后，楚继承了商文明在南方的发展，周继承了商文明在北方的发展，蜀继续和这些地区保持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晚期蜀文明中有较浓厚的楚文化因素，正是这个缘故。

考古材料说明以华夏族为主体的中华文明是多元化的耦合而形成的，各方国、各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方面的长期互相交流，取长补短，最后才出现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东西南北异彩纷呈的中国古代文明。